

“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基于 DID 模型的实证研究

刘志龙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昆明，650504；

摘要：生育是关系国民生计的重大问题。自 2016 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旨在通过激励家庭生育，应对当前面临的人口挑战。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诸如“相同职位薪酬差异”及“女性求职困境”等问题依旧显著。调整生育政策有可能加剧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统计性歧视程度加剧。本研究采纳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针对 20 至 45 岁年龄段的女性与男性群体，构建了双重差分分析框架，专注于探究“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收入水平所受的具体影响，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女性收入；DID 模型

DOI：10.69979/3029-2700.25.02.075

1 研究背景

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人口结构正面临着老年人口比例上升、青年一代生育率下降以及未婚人群比例不断增加等三重挑战。在此复杂的人口变迁背景下，促进生育率的提升已上升为现阶段至关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策略。依据国家统计机构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资料，在 2022 年年末，我国总人口数量为 141200 万，相较于前一年同期减少了 85 万，这是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除去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首次人口负增长现象。此外，全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 1.1 以下。为应对可能面临的人口压力，“全面二孩”政策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收入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在我国特定国情下制定并实施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国外学术界尚未开展对此政策的研究。国际学术界之研究焦点，多数聚集于探讨“生育成本”这一议题。教育程度的提升在女性群体中逐渐普及，导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度日益增高。学术研究表明，生育行为会对女性的收入水平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效应在女性生涯的长期发展中仍然持续显现。

经过不同国度学者的深入探究，发现女性在生育后其经济收入出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性别间薪资的不平等。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同样揭示了生育行为对女性劳动收入及其职场参与度具有不良影响（张川川，2011）。在 2017 年的研究中，熊海珠与袁国敏采纳了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及 Oaxaca-Blinder 分解技术，对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该分析揭示出，生育第二个孩子显著地降低了已婚女性在我国的收入水平。此现象的发生，一方面源于生育第二个孩子后，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就业的歧视程度加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生育后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更为尖锐，进而引发了工作效率的下降。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此前长达三十年对家庭仅生育一个孩子的限制得以解除。然而，此举使得女性不得不重新面对生育过程中的风险，并对她们的职业生涯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生育第二个孩子还会导致家庭经济压力的加剧。故而，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过程中，女性在职业成长与生育决策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抵触现象（程倩，2017 年），这一现象进一步激化了家庭女性在家庭与职场之间的冲突问题。通过对性别收入差异的维度进行分析，杨天池与周颖在 2019 年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开展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显著降低了女性群体的收入

水平，从而加剧了性别间的收入不平等。该影响主要集中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而对于教育水平中等偏低的女性，其收入水平并未受到显著影响。李红艳团队在2021年利用四期CFPS数据库，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性别间收入差异的影响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男性收入增速减缓，低于女性收入增速，进而导致性别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减小。所以，“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究竟对女性收入有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3 数据、变量和模型

本研究所用数据资源系源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简称CFPS）所提供的数据集，采用2014年及2018年的纵向数据，针对20至45岁年龄段的男女群体，在两次调查中均参与的个人，综合考察了生育二胎状况、教育程度、职业生涯长度、职业生涯长度的平方值、所属单位类型、居住区域、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因素，总计6768个观察样本，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	变量含义	变量定义
<i>ln wage</i>	个人月收入	
<i>Gender</i>	性别	女性=1；男性=0
<i>Birth</i>	生育二孩	生育二孩=1；未生育二孩=0
<i>age</i>	年龄	
<i>system</i>	单位性质	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1；否则=0
<i>marriage</i>	婚姻	结婚或同居=1；未婚或丧偶=0
<i>Exp</i>	工作经验	年龄-（受教育年限+6） 不健康=1； 一般健康=2； 比较健康=3； 很健康=4； 非常健康=5
<i>health</i>	健康	
<i>east</i>	东部	东部地区=1；否则=0
<i>mid</i>	中部	中部地区=1；否则=0
<i>time</i>	月工作时间	月工作天数×月工作时间

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基准回归分析框架，旨在评估生育行为对女性经济收益的影响。所应用的数学模型表

达如下：

$$\ln wage = \beta_0 + \beta_1 Birth + \beta_2 Edu + \beta_3 Exp + \beta_4 Exp^2 + \beta_5 X_i + \varepsilon \quad \dots \dots \quad (1)$$

采用双重差分法能够有效评估政策施行对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因果效应，同时该策略有助于规避由内生性问题所带来的干扰。本研究采取分组对比分析法，将女性划归为实验组，男性归入参照组，具体表达式为方程2：

$$DID = [E(Y_i^T | D=1) - E(Y_i^C | D=0)] - [E(Y_0^T | D=1) - E(Y_0^C | D=0)] \quad \dots \dots \quad (2)$$

全面二孩政策所带来的收入影响，通过DID模型得以量化，揭示了该政策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联性。本文DID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n wage = \alpha_1 Gender * Policy + \alpha_2 Gender * \alpha_3 Policy * X_i \beta + \varepsilon_i \quad \dots \dots \quad (3)$$

在所述分析模型中，鉴于“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正式施行，研究将2016年设定为基准年份。据此，在2014年，政策变量Policy的数值设定为0，而在2018年，该变量的数值则被设定为1。性别被定义为变量Gender，其中男性群体被指定为对照组，而女性群体则被划分为实验组。 $X_i \beta$ 为控制变量，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4 实证分析

4.1 OLS 回归结果

首先利用OLS估计生育二孩分别对男性和女性收入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基准回归方程结果

	女性月收入	男性月收入
生育二孩	-0.386*** (-3.92)	-0.073 (-1.27)
受教育年限	0.101*** (6.71)	0.056*** (6.27)
<i>Exp</i>	0.044*** (2.64)	0.039*** (3.49)
<i>Exp</i> ²	-0.041 (-1.01)	-0.098*** (-3.80)
单位性质	0.637*** (6.30)	0.124** (2.01)
婚姻	-0.219*** (-1.76)	0.261*** (3.67)
东部	0.636*** (5.53)	0.506*** (8.16)
中部	0.080 (0.65)	0.143*** (2.13)
健康情况	0.062 (1.55)	0.067*** (2.90)

常数项	4.716*** (16.29)	5.676*** (31.81)	常数项	7.237*** (176.81)	5.421*** (34.09)
拟合优度	0.098	0.115	拟合优度	0.058	0.118

根据表2的数据分析，女性在生育第二胎之后，其收入水平将降低32%，这一数据明确指出，生育第二胎显著地给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带来了消极影响。教育年限的延长对两性收入水平产生了正向效应，然而，相较于女性，男性的教育收益相对较低，这表明女性通过增加受教育程度有可能缩减与男性在收入方面的差距。婚后女性的经济收益往往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婚后女性倾向于将更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到家庭事务中，相应地减少了对职场劳动的参与，进而导致其收入水平的降低。

4.2 DID 回归结果

本研究利用DID模型得出的估算数据呈现在表3中。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当未纳入任何控制变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将对女性收入造成33.3%的下降影响。在纳入控制变量因素的前提下，回归分析的结果依旧指示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导致女性薪资水平下降，幅度达到33.63%。教育水平延长年数及健康状况与经济收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此结论与既有理论研究成果相吻合。此外，职业经验对于收入水平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在就业部门方面，服务于公共领域的个体相较于私营领域，其经济收益明显较高。

表3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月收入	月收入
女性×政策变量	-0.405*** (-4.45)	-0.410*** (-4.66)
政策变量	0.786*** (13.57)	0.640*** (10.77)
女性	-0.442*** (-6.88)	-0.498*** (-7.94)
受教育年限		0.081*** (10.21)
Exp		0.041*** (4.25)
Exp ²		-0.073*** (-3.27)
单位性质		0.354*** (6.41)
婚姻		0.12 (0.18)
东部		0.557*** (9.60)
中部		0.098 (1.56)
健康情况		0.066*** (3.12)

4.3 异质性分析

不同地区、不同受教育程度以及不同的工作单位性质的女性受“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也不同，本文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得出的结果如表4所示。

在探究地区性影响的研究成果中，观察政策对东部及中部地区女性产生的经济效应，明显呈现出消极影响，在实施该政策的过程中，相较于东部区域，中部区域女性所承受的收入下降效应更为显著。

在探讨教育程度与收入关系的背景下，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对于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收入影响微乎其微。此现象或许源于这部分女性对于生育第二个孩子意愿相对较低，她们倾向于对个人职业生涯进行周密规划，并持有较高的职业期望。然而，生育二孩往往导致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加剧，从而降低其劳动市场参与度，迫使她们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家庭照料与子女教养，这一转变对她们的职业发展构成了不利影响。在就业环境中，对于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女性，雇佣实体所展现的歧视倾向相对较轻。

在探讨职场性别分布与生育政策影响的关系时，观察到女性在公共部门从业者受“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并不显著，与此相对照，非公共部门女性则承受了该政策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在比较非公共部门与公共部门时，观察到的现象表明，后者所受“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该现象或许归因于公共部门在构建保障女性权益的相关制度方面，其完善程度超越了其他领域。

表4 异质性分析

受教育程度	单位性质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大专及以上		
中部	西部	-0.592*** (-3.41)	-0.257 (-1.09)	-0.496*** (-3.79)	-0.637*** (-2.99)	-0.257*** (-2.15)
		0.780*** (-4.41)	0.792*** (-5.55)	0.683*** (-8.35)	0.624*** (-6.4)	0.650*** (-7.29)
		-0.533*** (-4.41)	-0.576*** (-3.46)	-0.626*** (-6.86)	-0.478*** (-3.19)	-0.249*** (-2.69)
		√	√	√	√	√
		0.105	0.106	0.092	0.122	0.125

5 结论

本文通过双重差分法，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收入的变化进行了定量评估，得出以下结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显著导致了女性收入水平的下降；该政策对不同地域、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工作单位性质女性群体的作用力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随着生育政策的重新配置，女性在职场中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更为严苛的竞争压力。为确保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运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女性人力资本；优化儿童抚育服务架构，减少女性分娩的经济负担等策略，确保女性在职场中的权利。

参考文献

[1] 李红艳, 邵欣露, 曹娜. “全面二孩”政策与性别收入差距：拉大还是缩小——基于四期 CFPS 数据的实证

- 分析[J]. 经营与管理, 2021, (08): 74-79.
- [2] 贾男, 杨天池. 带薪产假与女性工资率——基于各省晚育产假奖励政策的实证研究[J]. 当代财经, 2019, (12): 3-16.
- [3] 熊海珠, 袁国敏. 生育二孩对不同地区女性工资率的影响——基于匹配法及 Oaxaca-Blinder 分解的分析[J]. 绥化学院学报, 2017, 37(12): 1-5.
- [4] 程倩. 二孩政策对白领职业女性的影响[D]. 安徽大学, 2017.
- [5] 张川川. 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11, (05): 29-35.

作者简介：刘志龙（2000—），男，汉族，单位：云南民族大学国民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